

害，应该看到大都死于征方腊的战斗中，而“血染沙场，马革裹尸”，正是古代英雄豪杰向往的归宿之一，正如阮氏兄弟所说：“我哥哥今日为国家大事，折了性命，也强似死在梁山泊埋没了名目。”尽管宋江、卢俊义等被鸩而死，但“身当庙食死封侯，男子平生志已酬”的理想毕竟已实现。梁山英雄豪杰的真正悲剧，在于英雄失时，逼上梁山，“自身最不情愿走的路而最终不能不走，这乃是人生的真正悲剧”，①这里，我们不妨将两组人物作一简单的比较：

一是诸葛亮和宋江。

诸葛亮自比管、乐，有经天纬地之才。他躬耕垄亩，隐居隆中，以待天时。刘备三顾茅庐，他应命出山。从此，不畏艰辛，南征北战，开创了鼎立三分的大业，成为万世贤相的楷模。宋江“自幼曾攻经史，长成亦有权谋”，身为郓城小吏，久有凌云壮志，然而年岁徒长，功名未遂，几经死难，尽管他认为上山落草是“上逆天理，下违父教”，终于身不由己，不得不逼上梁山，同为英雄，一出山开创大业，一上山落草为寇，命运何其不同！

二是关羽和武松

关羽“傲上而不忍下，欺强而不凌弱，恩怨分明，信义素著”。武松“平生只是打天下硬汉，不明道德的人”，知恩必报，见义勇为。二人同样义勇双绝，又都因人命干系避难江湖。然而，关云长生逢乱世，又遇明主，遂乘时而起，威镇华夏，为开创蜀汉基业，建下丰功伟绩。虽有麦城之败，但生时封侯，死后为神，功成名就，壮志已酬。武二郎行侠仗义，除暴安民，却不能容于社会，至使英雄无路，落草为寇。后虽得招安，亦建战功，却落

得断臂身残，独守青灯古塔，了却残生。二人同为英雄，命运竟如此相异？

显然，和三国英雄相比，梁山好汉真是时乖运蹇，生不逢时。梁山好汉所处的时代，是李贽所说的“冠履倒施，大贤处下，不肖处上”的时代。梁山英雄们，忠如宋江、杨志，他们有志报国，却报国无门；勇如鲁达、武松，他们见义勇为，却反遭迫害。扶弱济贫的义士，除暴安良的豪侠，本是古代老百姓苦难中的救星，他们能拯救别人，却不能拯救自己，竟落得有家难奔，有国难投，不得不铤而走险，逼上梁山。英雄的志向不能伸展，英雄的行为不为世容，落草为寇的现实粉碎了建功立业的理想。英雄与时代发生了冲突，时代压抑了英雄。一部《水浒》谱写的就是这样一首英雄失时的悲歌。难怪清人王望如要在他的《五才子书水浒序》中叹息道：“之百八人者，非宋朝之乱臣贼子耶？苟生尧舜之世，井田学校，各有其方，皆可为耳目股肱，奔走御侮之具，不幸生徽宗时，或迫饥寒，或逼功令，遂相率而为盗耳。作者之旨，不责下而责上，其词盖深绝而痛恶之，其心则悲悯而矜疑之，亦有关世道之书，与宣淫导欲诸稗史回异也。”②

综上所述，《三国》和《水浒》，一为乱世英雄的颂曲，一为绿林豪杰的悲歌，它们讴歌了中华民族史诗式的传奇英雄，唱出了不同时代英雄豪杰的不同命运。其故事的深层结构里，潜藏着古人对英雄和时势关系的深思。

① 左东岭：《论〈水浒传〉的悲剧特征》，《郑州大学学报（哲社版）》87年第2期。

② 见《水浒传会评本》上册第34页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。

一借再借的常时节——读《瓶》记失之四

西门庆的诸帮闲兄弟中，常时节是个常时节的朋友，与西门庆过从交往，多有伸手求借的事。不过，《金瓶梅词话》第60回中，讲及常时节为置办一处房子以度日子而向西门庆求借，居然前后借了二次，这也未免太多了点。

这60回中，写西门庆的缎铺开张，众人均来庆贺。在座者有常时节。“原来西门庆近日为了他五十两银子，使三十五两典了房子，十五两银子做本钱，在家开个小小杂货铺儿过其日月，不题。”谁料，在同一回中，作者又画蛇添足道：

却说次日……西门庆因问伯爵道：“常二哥说他房子寻下了，前后四间，只要三十五两银子，就卖了。他对我说，正值小孩病重了，我心里正乱着哩，打发他去了”“也罢，你吃了饭，拿一封五十两银子，今日是个好日子，替他把房子成了来罢。剩下的教常二哥门面开个小本铺儿，月间撰的几钱银子儿，勾他两口儿盘缠过来。”伯爵应命而去。

这样看来，常时节竟短时间里遭西门庆周济两次，且都花了三十五两银子买了房产等，恐怕借得也太多了吧？

（悠悠）